

21 世纪长江中游发展的突破口

扩大开放面 / 提高开放度 / 开辟自贸区

主编 夏国政 副主编 罗时凡 高小红

武汉十

923

F-210.4
x26

21 世纪长江中游发展的突破口

• 扩大开放面 • 提高开放度 • 开辟自贸区

主	编	夏国政		
副	主	编	罗时凡	高小红
参	编	者	简德齐	胡敏
			夏雷	罗吉



A0876660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1 世纪长江中游发展的突破口: 扩大开放面; 提高开放度;
开辟自贸区/夏国政主编; 罗时凡, 高小红副主编; 简德齐…
〔等〕参编.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8. 12

ISBN 7-307-02563-9

I. 21…

Ⅱ. ①夏… ②罗… ③高… ④简…〔等〕

Ⅲ. 发展战略—长江中游地区

Ⅳ. F120.4 F127.5

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湖北省荆州市今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434000 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红门路桥)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发行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

字数: 360 千字 印数: 1—2000

ISBN 7-307-02563-9/F·558 定价: 1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承印厂调换

第一章 长江流域的历史源流

长江的历史，远远早于人类的历史。

人类在地球上的出现，只有几百万年时间，而长江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距今7 000 万年前。当时，在现今长江流域发生过一次“燕山运动”，使业已存在的四川盆地上升，洞庭湖盆地下降，位于湖北西部的古长江开始发育，并向着四川盆地溯源延伸。

经过了漫长的几千万年之后，即距今约3 000 万年前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又使现今长江上游的地面上升，形成了气势宏伟的高山与峡谷，而长江下游一带由于上升幅度很小，并伴随着陆地下沉，形成了广阔的湖泊和平原地区，如两湖平原、鄱阳湖平原、苏皖平原等。古长江的溯源延伸得益于这次造山运动，使之最终能与四川盆地的水系沟通，接金沙江之水，其江源地区可以上溯至青藏高原唐古拉山脉主峰各拉丹冬雪山西南山麓。

长江之水从它的正源沱沱河开始，自西向东，激流翻滚，一路上纳千溪万河，经千回百转，飞峡越谷，劈险夺隘，以惊天动地之势，浩浩荡荡地奔向大海。长江永不停歇的生命搏动，赋予了我们中华大地的勃勃生机。

长江的历史，是一部浩瀚渊深的发展史，它记载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沧桑历程。

长江的流水，是一条哺育生命的滋养源，它孕育了我们中华民族的灿烂文明。它养育过人类的祖先，又给予了我们民族永恒的生命力。

一、长江流域的早期人类活动

人类的文明，最早均起始于大江大河之畔。有一种说法，把人类最初的文明发源地归于四个地区：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的下游，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流域以及黄河中游地区。不过这种说法是从现存民族整体演化的历史出发而得出的结论。

如果把人类的起源作为起始点进行考察，那么至少在中国，人类文明的策源地有长江与黄河两个渊源。现已掌握的考古资料表明，长江流域的早期人类活动，比黄河流域更早、更长。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由于早期高级灵长类古动物化石在北非的发现，人们一直以为包括人类在内的高级灵长类动物起源于北非。而 1995 年 5 月中旬，从我国召开的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学术讨论会议上传出了一个举世震惊的信息：中国科学家经过十几年考察论证，发现人类祖先的发源地就在中国。因为科学家们在位于长江下游区域的江苏省溧阳市上黄镇一带发现了大量的古动物化石，其中约有 50 余种哺乳动物化石，并确认上黄镇的高级灵长类动物的生存年代比北非的要早 800 万至 1 000 万年。也就是说，早在 4 500 万年前，上黄一带是一个森林茂密、食物丰富的地方，这里已存在成群的高级灵长类动物，这里才称得上是人类起源的摇篮。

人类的祖先是怎样从几千万年前的高级灵长类动物中分化出来的？我们还未弄清。但被世界考古界认定的处在猿与人之间的腊玛古猿化石在我国也被发现。1978 年 12 月，我国考古学家在位于长江上游地区的云南丰禄县石灰坝发掘出三个腊玛猿头骨及其他化石，经科学鉴定，其生存年代距今约 800 万年，是属于最早“正在形成中的人”的古化石代表。这一发现同样震撼了世界，西方学者甚至认为：“人类起源的钥匙”掌握在中国人手里。

上面两处重大发现，使我们有理由相信：人类起源的光芒最

早升起在中国，升起在中国的长江之畔。

早期的人类活动，是从人类站立起来、在有意识支配下从事某种生产劳动开始的，而劳动又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人类最早使用的劳动工具是石器，我们称这一时代为“石器时代”。考古学上又把从打制石器到磨制石器这一漫长年代划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两个时期。

从现在已经发掘的人类早期活动的大量文化遗址可以看出，远在旧石器时代的早期，长江流域就有了远古人类的活动。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长江流域的上、中、下游三个区域，都有着极为丰富的文化遗址，充分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在长江之畔的劳动、生息和繁衍。

（一）长江流域旧石器时代的人类活动

在旧石器时代，远古人类经历了从猿人到古人、新人三个发展阶段，这也是旧石器时代早期、中期和晚期的划分标志。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长江流域从西到东都有极为重要的人类活动遗址的发现。

1. 长江上游地区的远古人类遗迹

这里最重要的发现，是我国学者1965年5月在云南元谋上那蚌村（位于金沙江畔）发现的距今178万年的猿人化石，该猿人被定名为“元谋猿人”。同时，还在元谋猿人化石层位中发掘出打制的石器17件，发现有不少哺乳动物的肢骨碎片以及大量的炭屑和伴有经过燃烧变黑的烧骨。专家们认为，元谋猿人不仅能开始制造和使用工具，也开始使用火。1986年10月，考古专家们在四川省巫山县龙坪村龙骨坡一处洞穴中，还发现了距今204万年的一块古猿人的右上侧门齿及一块下颌骨化石。同一洞穴中还有巨猿化石和10种哺乳动物化石（但没有发掘出石器）。这一发现至少把中国最早存在人类的时间又提前了几十万年。

在长江上游地区，还发现了一些旧石器时代中期和晚期有代

表性的古人化石、新人化石。例如，1972年在贵州桐梓九坝云峰岩灰洞发现了两枚古人齿化石，一个是青年个体，一个为老年个体，均属早期智人，生存年代距今约20万年，同时发现的还有石制品20多件，有两块兽骨经过了烧灼。1951年在四川资阳黄鳊溪桥基旁发现了一个残缺的头骨，面骨中仅有上颌骨，属于与山顶洞人同一期的晚期智人，距今约17 000年。

2. 长江中游地区的远古人类遗迹

1975年夏季，位于湖北西部的郧县梅铺镇龙骨洞，发现四颗猿人左侧牙齿化石，还发现了一件打制的石核及20多种哺乳动物化石。经科学鉴定，郧县猿人早于北京猿人，距今约70万至80万年。1976年在与郧县连接的郧西县神雾岭白龙洞，又发现了两颗猿人臼齿，洞中还发现有豪猪、巨獭、犀牛、剑齿象等20多种动物化石。生存年代与北京猿人大体相当。

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智人（或古人），在长江中游地区也有发现。例如，1956年在湖北长阳县起家堰发现了一古人的左侧上颌骨并附连两颗臼齿，还有一颗前臼齿，嘴部和上颌与现代人有些相似，但又有一定的原始性。其地质年代为晚更新世早期，距今约10万年。长阳智人被专家们认定是我国著名的早期智人代表之一。除此之外，考古学家还在湖北大冶县石龙头发掘出利削石器制品88件，在湖南澧县鸡公垸出土各种人工打制的石器制品200余件，表明在洞庭湖区10万年前就已有人类的活动。

长江中游出土的大量哺乳动物化石，均属南方“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类型，这说明这里的早期人类是在一个有森林、草地、湖泊、沼泽及河流错杂、气候温暖湿润的自然环境中，过着采集与渔猎相结合的生活。

3. 长江下游地区的远古人类遗迹

最有代表性的发现，是1980年11月在安徽和县城北15公里处的龙潭洞，发现了我国现存完好的旧石器时代猿人头盖骨化

石一具，还有一块左下颌骨和几颗牙齿，并发现了骨器、角器，其加工清楚，类型稳定。另有烧过的骨头、灰烬等遗物，用火证据十分确凿。“和县猿人”所处的地质年代不晚于“北京猿人”，距今约 70 万年左右。考古学家们认定，“和县猿人”是不同于“北京猿人”和“爪哇猿人”的一种新的类型。这一发现证明，长江流域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并非从中原迁徙而来。更令人惊奇的是，1993 年 3 月在南京东部 27 公里处的汤山古人类遗址，出土了一具较完整的古人类骷髅，有头盖骨，也有面骨，包括鼻骨、眼眶骨和部分上颌骨，而且没有完全石化，脑容量明显大于猩猩而小于现代人。经专家们鉴定，一致确认属于 30 万年的猿人，中国科学院将其命名为“南京猿人”。

另外，在江苏泗洪县下草湾、丹徒县白龙岗山莲花洞、宜兴县石牛山灵谷洞等地，发现了距今 5 万年至 1 万年的新人化石。在江苏东海县大贤庄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各种石器制品 200 余件，有的明显为当时人们采集和渔猎的劳动工具。

（二）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的人类活动

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遍及长江流域。特别是从鄂东到川东的长江中上游地区和以钱塘江、太湖流域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地区，到处都出现了先民们的散居或聚居点。从已经发掘出来的文化遗址看，长江流域的原始人类已经达到了一定的原始生产力水平和较高的原始文明，为我们展现了原始社会母系氏族公社和父系氏族公社的繁荣图景。

1. 母系氏族社会时期

母系氏族社会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形成，到新石器时代早、中期获得充分发展。代表长江流域母系氏族社会时期的文化遗址，主要有早期的城背溪文化、彭头山文化、皂市下层文化、河姆渡文化和中期的马家浜文化、大溪文化等。

20 世纪 80 年代陆续发掘出来的湖北宜都县城背溪遗址、湖

南澧县彭头山遗址，其年代距今都在8 000年前。继彭头山文化发展而来的皂市下层文化遗址，位于湖北天门市皂市镇附近，距今也有7 500年左右。这些都属于我国新石器时代最早的文化遗存。它们充分说明长江中游一带曾是我国原始社会先民们活动最早的区域之一。

在母系氏族社会时期，氏族内部的男女禁止通婚，以母系的血统确定氏族的成员，在氏族社会生产中也以妇女为中心，所以妇女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都比较高。人死后的随葬品是反映人们生前地位的重要证据。大溪文化的早期墓葬群中，唯有一老年妇女的随葬品达56件，比其他人都多，就反映了这一老年妇女在氏族中的地位。母系氏族繁荣时期的生产标志，是原始农业和家畜饲养业的出现。河姆渡遗址中发现了人工栽培的粳稻，距今已6 000多年，被认为代表了世界上最早的农业。存在于彭山头文化遗址的稻谷壳，据鉴定亦属人工栽培稻，其年代可上溯到8 000年前。这说明长江中下游也是我国原始农业的起源区。河姆渡遗址中发掘出纺车以及用三经二纬编织的苇编，大溪文化遗存中石、骨、陶制的各种纺轮及骨针，则表明当时原始纺织业已相当发达。农业的发展，粮食及猎物的增加，使家畜饲养业逐步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也为原始的制陶手工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母系氏族社会的晚期，农业已开始成为社会的主业，人们的生活用品大多采用陶制品。1995年对彭头山遗址的进一步发掘，发现了两幢面积大而完整的房屋墙，内有三个火口的大灶，用红烧土块砌成，火塘内有草木灰迹，房内还有大量饮食用的陶器。另外相当于大溪文化晚期的制陶作坊以及制陶工具，如打磨的石球等，都具有了相当的技术水平。原始生产力的发展，也促进了当时人类精神文明的发展。例如河姆渡发掘出来的人类最早的吹奏乐器，湖北黄梅县焦墩出土的距今6 000多年的“卵石摆塑龙”，江苏连云港将军崖、四川珙县、云南沧源发现的原始社会的岩画，能画出太阳、神的形象，等等。这些都明白无误地告诉

我们，长江流域的原始先民们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文明程度，或者说不低于当时其他地方的原始先民们的文明水平。

2. 父系氏族社会时期

大约在距今 5 000 年前后，长江流域的氏族部落，都先后进入到父系氏族社会阶段，这个阶段相当于新石器时代的晚期。以江汉平原为中心的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江苏淮安的青莲岗文化，以及浙江杭州的良渚文化等，都向我们展示了长江流域父系氏族社会时期的图景。

父系氏族社会时期，社会生产力又有了新的提高，继畜牧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之后，手工业也从农业中分离出来，这是人类社会的两次大分工。男子成了农业的主要劳动力，女子从事家庭纺织等劳动，“男耕女织”的局面开始出现。农具的改进和手工技术的提高，则是生产力进步的重要标志。当时，长江流域的农业生产已普遍采用了穿孔的磨制石铲、石镰、蚌镰等。屈家岭文化时期还使用了双孔刀、肩石锄，以便于装柄、系绳，提高劳动效率。屈家岭遗存中还出土了扁薄的中小型彩陶纺轮、蛋壳彩陶碗、杯和圈足壶等。有的陶器胎薄，仅 0.1~0.2 厘米，它反映了这一时期农业和手工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在浙江钱山漾遗址中还发现了这一时期的纺织品，其中有绢片、丝带、丝线等。经过鉴定，纺织品所用原料竟是家蚕丝。可见中国丝绸的历史源流之长远。

当时生产力的发展，已使社会剩余财产大量增加。由于男子在生产和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加上单偶婚的出现，产生了个体家庭，世系的计算和财产的继承已由父系支配了。这样，有了剩余产品就被个体家庭或家族的首领占为私有。私有财产的产生及贫富分化的出现，也随着父系氏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起来，这在当时的墓葬遗存中得到充分的反映。在旧石器晚期，墓穴中已有与身相随的个人使用物品殉葬，到新石器晚期因私有产品的增加，殉葬品除个人使用物品外，还有生产工具，甚至有抓到的战

俘。例如，在苏北邳县的氏族墓地中发现男性的墓比女性大，主要随葬的有石铲、石镐、石镰等农具。江苏吴县张陵山一处早期良渚文化的墓葬中，发现墓主人的随葬石器、陶器、玉器有40多件，墓主的脚下有3个殉葬的人头，可能是把被抓住的战俘作了殉葬品。屈家岭遗址的一处墓地，发现一座大墓中的随葬品有70余件，而一座小墓的随葬品则只有两件；贫富不均现象已很明显。石家河遗址中的一处墓地中，考古学家还发现了镂刻精致的玉器56件，其中有玉蝉、玉管、玉兽、玉人等，有两件人面像和一件飞鹰十分精致。这些随葬品的工艺水平，表明了当时的私有财产已经相当丰富，也就是说，距今4000多年前的石家河文化时期，长江中游的私有财产制度已经确立。

为了争夺私有财产，父系氏族社会部落内部的成员之间，以及氏族的部落之间，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争斗，发生战争。到了氏族制的末期，部落联盟已经出现，部落联盟的首领已拥有相当的权力。我们的祖先尧、舜、禹相互“禅让”权位的佳话，就是在这个时期。然而，私有制的出现与发展，必然要加速原始氏族公社制的瓦解。无论是长江流域还是黄河流域的原始先民们，都无可避免地从无阶级的原始社会跨入到有阶级的社会——新的社会文明曙光在中华大地上冉冉升起。

二、长江流域的文明发育阶段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绚丽多姿，五千年的文明史，人们一般都要追溯到炎、黄时代。据有的专家考证，作为中华民族共同祖先的炎、黄二帝，历史上确有其人。最早的炎帝神农氏和黄帝轩辕氏为亲兄弟，均生于今宝鸡境内，距今约五千五百年。当时，黄河流域的中华先民已进入到原始社会的父系氏族阶段，炎帝和黄帝分别成了居于黄河中上游和下游的两个氏族集团的首领。由于他们最先倡导耕耘，种植五谷，采取了各种兴利于民的措施，

使黄河流域较快地实现了从渔猎业向农耕业的过渡，并在此基础上孕育出了华夏的农耕文明。

据史书记载，炎帝和黄帝曾联合在一起，与南方九黎族的首领蚩尤大战，即所谓“涿鹿大战”（约在今河北省涿鹿县）；在共同击败蚩尤之后，炎黄二帝两大部落之间又有“坂泉之战”（今河北怀来县）。结果炎帝族被打败，黄帝族主宰了黄河中下游广阔地区。原始社会解体后，在黄河流域先后建立起了夏、商、周三大王朝。相传夏、商、周人的始祖都与黄帝有血亲联系，夏人的始祖大禹就是黄帝的玄孙。正因为如此，黄帝便成了中华各民族共同祭奠的先祖，成了开创华夏文明的第一人。

应当说，夏之后的殷商西周时期，中华民族才真正从野蛮时代步入文明时代的大门。当时，定居于黄河中下游的华夏族即后来的汉族，已经有了自己的文字记录，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化，使中原一带成为全国最富裕的地方。这里又是几代王朝版图的中心地区，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把握中原，意味着把握住了天下。所以，在中国整个奴隶制社会时期和部分封建时期，国都均建立在中原一带。

当黄河流域以其经济政治中心雄踞中华之时，长江流域的文明也发育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前面已经说过，长江流域的农业发生期并不晚，只是由于当时发展农耕的自然条件比黄河流域要差，难以用铜石农具耕作，加上南方水稻的种植技术要求较高，其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尚不及黄河流域。因而，当黄河流域形成了某种“农业共同体”的时候，长江流域上、中、下不同区域，仍然“分而治之”。诸多民族以其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创造着相对独立的民族区域文化，其中最有影响的是长江中游的荆楚文化、长江下游的吴越文化和长江上游的巴蜀文化。这三大具有区域民族特质的古文化，不仅构筑了长江流域“青铜时代”的文明，同时也是中华文明发育与发展的十分重要的基础。

（一）长江中游的荆楚文化

荆楚文化的地域范围，大致在今湖南、湖北以及河南、安徽、江西的部分地区。远古时代，长江中游的江汉地区活跃的居民是“苗民”，即所谓“三苗”。夏禹南征三苗，“定荆州”之后，芈姓部落离开中原故土，南迁江汉地区，芈姓荆人的酋长鬻熊立国于荆山一带，有建都丹阳之说。其重孙熊泽在周成王时被封于楚蛮之地，立楚为正式国号，国都仍在丹阳，荆楚文化因此而得名。

荆楚文化在公元前 23 世纪就有了较大的发展，与同时期的北方商文化相比，有不少共同点：首先是青铜器在楚地已有较高水平的发展。在江西新干县发掘的一座商代大型墓葬中，有青铜器 480 余件，包括犁、手斧、裁制刀等；在湖北沙市殷商遗址中出土了青铜削刀和鱼钩等；在江陵张家山遗址中出土了商代的一件铜镞、西周时期的一件铜鱼钩。这些说明，在商、周之际，青铜器就已经应用到楚人的生产活动之中。最能代表当时楚文化发展水平的遗物是位于湖北黄石的铜绿山铜矿遗址，其采掘年代始于西周，春秋战国时代为极盛期。考古发掘表明，当时楚人已经掌握了铜矿的勘探、竖井巷道施工、采掘、选矿、冶炼的全套技术，而且铜产量多达 10 万吨左右。规模之大，属世界之最。另外，1978 年在湖北随州擂古墩出土了一套战国时期的青铜编钟，其制作之精良，音色之美妙，堪称中华古文化之精髓。

在楚国与商、周政权之间还有一批小国，如随、邓、蔡、徐、郑等。它们既成为南北争夺的对象，又成为南北交流的桥梁。楚人经过多次劫难，艰苦卓绝地创造出了独特的楚文化，如所谓的“楚人信巫”。巫是楚人的一种独特信仰，巫在楚人心目中的地位，远远高于在春秋时代的其他民族心中的地位。楚民认为天上有神，人间的各种行为要受天神的支配，巫则是神与人之间的一种中介。所以，楚人对神、鬼虔诚至极。

楚人的祭祀仪式，均要歌舞相伴，人们往往围绕巫师，大家共歌共舞，即使独舞也有众人伴唱。所以，楚歌、楚舞曾风靡一时。刘邦曾对戚夫人说：“为吾楚舞，吾为若楚歌”；项羽在自杀前唱《垓下》；汉高祖功成时咏《大风》，这些都是楚歌。可见，荆楚文化对长江文明发育的贡献，对中华文明发展的影响，是十分突出的。

（二）长江下游的吴越文化

相传夏王朝的首领大禹治水，南达今天的江、浙、皖等省。夏朝的统治势力也延伸至这些地区。大禹治水到过长江下游的“裸国”、“黑齿国”，“裸国”也就是古之吴地，即今无锡、苏州一带。这里的人们有“断发纹身”的习俗，经常裸体从事“水事”活动，故称为“裸国”。大禹治水还南达“大越”，即今之浙江绍兴境内。因大禹治水成功，曾在绍兴“会稽”召开各地诸侯大会，论功行赏。如今绍兴会稽山麓仍完好地保存着禹王陵和禹王庙，以纪念他一生治水的不朽功勋。

到春秋战国时代，吴越的地理范围已扩大到今天的江苏、浙江、上海和安徽、江西部分地区。春秋晚期，吴国建都姑苏（今苏州市），越国建都会稽（今绍兴市）。由于两国之间连绵不断的争战，使得具有近亲关系的远古吴文化与越文化相互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吴越文化。

考古发掘表明，古吴越之地，与商、周王朝的联系也是很多的。在江苏北部铜山县发现的商代遗址，就是商朝统治下的一个村落；在南京北阴阳营古代遗址里，还发现距今3 000多年的青铜箭头、刀等工具与武器；皖南屯溪发掘的西周古墓中，出土了众多的青铜器，如鼎、殷盂、尊、乌饰、五柱形乐器等。这说明吴越之地的人民在青铜器铸造技术方面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春秋战国时代吴越的青铜戈剑铸造技术，堪称绝技。在湖北江陵出土的越王勾践剑，历尽两千余年岁月侵蚀，今犹寒光闪闪，锋利

坚韧；后在河南淮阳县一座楚墓中出土的“越王剑”，为越国所造的铜锡合宝剑，双刃锋利，造型优美，令人赞叹不已。

春秋战国时代，吴越地区的水稻种植已相当发达。从所谓“春种八谷”中，可见稻谷品种之多样。另外，吴越两国也是长江下游最早出现纺织业的地区，而且是丝绸之乡。相传越国美女西施是浙江省诸暨浦阳江畔苎萝山村人，她在被越王勾践献给吴王之前，在家继承母业，养蚕织丝，常浣麻纱于村旁江边。现在江边的山壁仍留有斗大的“浣纱”二字，乃大书法家王羲之的手笔。由此证明，当年浙江较偏僻的乡村已经能生产丝绸了。

吴越人的语言文字，也自成体系。吴国语言的语音与同时期的荆楚语言有很大差别，以至于吴歌须经翻译，才为楚人所懂。吴越虽通行华夏族文字，但也有改造，形成一种与绘画同样的字体，即所谓“鸟虫书”。吴越人的风俗习惯除“断发纹身，裸以为饰”以外，还“祠天神上帝百鬼”，甚至保留较长时期的“人殉人衅”制度。史书上对这些多有记载。

（三）长江上游的巴蜀文化

巴蜀文化典籍，留存下来的资料不多，巴蜀文化中仍有一些不解之谜。巴蜀一般以四川为中心，还包括陕南、鄂西及云南、贵州的部分地区。大约从商代开始，长江上游的巴国与蜀国，均为商王朝的方国，后来都参加周武王伐纣，此后，巴蜀与中原周王朝的联系就比较密切了。到春秋战国时代，巴蜀地区已经形成一种不同于中原地区而自成特色的区域文化。

新近在长江三峡库区进行考古发掘，先后在四川涪陵市的小田溪、镇安和忠县的井沟遗址中，清理出 50 余件典型的巴式器物；在云阳县李家坝遗址发现了一处目前最大的巴人墓地，从已经清理的八座墓中出土了巴式剑、矛、钺和陶豆、罐、盂等器物；在巫山县双堰塘还出土了巴人用过的土铍、鱼钩等铜器。从出土文物及有关文献分析，春秋时代的巴国人，其生产工具和生

产力发展水平既不及中原地区，也不及楚国。这里的农业仍然是“刀耕火种”，以游牧业为主。巴人英勇善战，也能歌善舞。史料记载：在周武王伐纣时，“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

蜀人生息于四川成都平原一带。战国初期（公元前 475 年），蜀王开明世治水，开凿沱江，疏导青衣江，使蜀国的农业较为发达。秦昭王末年，李冰父子率民治水，修筑了著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既显示了蜀民的聪明才智，也表明蜀国的农业生产力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由于这里沃野千里，水害不多，不仅粮食丰足，纺织业也很兴旺。蜀地特产的丝织品称“绵”，实际上是一种缎，还有木棉布和细麻布等，均享誉千里。

巴人蜀人的发式十分接近。从川东的巴县到川西的峨眉，均出土了大量铸有“椎髻”人头形符号的青铜器，由此可以推定当时巴蜀居民的一种独特的文化习俗，还有一种更具特色的习俗，即船棺葬和悬棺葬，至今仍是不解之谜。

三、长江流域从农耕文明 向工业文明的转变

如前所述，早在六七千年前的彩陶文化时期，长江流域的先民就进入到以种植业为基础的农耕时代，这与黄河流域农耕文明的兴起以及世界其他主要古文明的发展大体是同步的，只不过从原始社会后期到奴隶制社会的发展阶段，由于黄河流域的自然条件比长江流域优越，更适应当时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加上华夏民族在那块土地上长期耕作、经营，使那里的农耕业发展更为迅速。殷商西周时代，农耕业已成为那里居民生活的主要来源，特别是进入春秋战国时代后，由于耕牛在中原一带出现，铁制农具的渐次采用，以及推广良种、重视防治病虫害等，使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最早由广种薄收达到“深耕细耨”的较先进的生产力水

平。这一切使黄河流域成为早期中华农耕文明发展的中心。

长江流域早期农耕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黄河流域农耕文明兴起的影响，但它还有自身发展的基础。这里是水稻种植业的发源地，居民有定居务农的传统，加上长江流域的水土、气温等自然环境均适用于水稻等农作物的生长。一旦铁制农具和耕牛在农田生产中得到普及，长江流域便很快演进为农产丰富的耕作区，从而使这里的农耕文明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正是长江的农耕文明与黄河的农耕文明相互促进，才构筑了中华农耕文明发展的根基，创造了中国古代历史的辉煌。中华民族在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之后，才从农耕文明步入工业文明。而在这个历史性转变过程中，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一直走在全国的前面。

（一）长江流域农耕文明中心的形成

中国古代的农业社会，是由千百个基本相似、又极端分散，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的村落与城镇而组成的，为了维系各民族间的利益关系和社会安定，抵御游牧民族的袭击或入侵，全社会需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君主集权的政体。所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与宗法专制制度的结合，便是中国农耕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建立霸业，采取了一系列的统一措施，又使中原居民大批南迁，这对当时长江流域农耕文明的发展是一个很大的推动。秦汉时期，尽管长江流域的农业经济还不及黄河流域农业经济的发展水平，但长江流域农耕文明的发展程度并不落后。这从已经发掘的文物中可以证明：1975年在湖北云梦县的战国至秦代的墓地中，发掘出了大量秦代竹简，其中包括部分秦朝法律。秦兼并楚国后，设置南郡。当时，楚地以及长江流域的其他地区均纳入统一的法制轨道。这无疑是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阶梯，会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汉高祖刘邦建立西汉政